

久病床前有孝女

——孙晓晴悉心照料瘫痪养母的故事

沈怀宝

我的工商情结

谈国兴

1975年1月从公社工商助理到2000年1月在区工商部门退休,我整整26年工商工作生活的往事至今让我难以忘却。

我清楚地记得,1974年,我担任车桥公社工商助理。1975年10月份撤销了“打指部”(打击投机倒把指挥部)成立了淮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那时县工商局每月召开一次全县工商助理会议,布置一些市场管理的相关事情,可往往得不到有效落实,因为人权、财权不在工商局。直至1979年10月份,淮安县在相关公社设立工商所才理顺关系。那时,全县共设立了淮城、石塘、车桥、流均、苏嘴、顺河、钦工、黄码林集共九个工商所。我被任命为车桥工商所所长,配一名副所长,两名办事员。第二年人员又增加了4人,共9名人员,管理车桥、朱桥、溪河、施河四个公社。工商所的主要工作有两件,一是打击投机倒把(各种贩卖贩卖);二是管理集市贸易(维护市场秩序)。在那个经济还没有搞活放开的年代,有很多商品是不允许对外流通。在车桥当时主要是猪肉、大米的贩运,一些人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偷偷地做着贩运生意。为此,执法人员经常深夜出去巡查。有一次,夜间巡查到6条装运大米的大船,一直追到流均的渡口,才将船只堵住,在管理与反管理过程中,4名同志被贩运人员殴打并被推下冰冷的水中。在这种情况下,执法人员还是将船上10多吨大米查获,最终由流均粮管所按国家牌价收购。除了维持正常的秩序外,还要检查禁止入市商品。一年一度的农村两季大忙,县里规定要关闭农村集市贸易。每到农村大忙季节,我们忙着在所在辖区布岗放哨,不准农村社员上街,让劳动力全身心投入大忙中。由于车桥集市关闭工作做得出色,我还受到了时任县长叶荫梅的表扬,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这些事现在看来很可笑,可那时却是基层工商所的主要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对工商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管理小商小贩上,而一些企业对工商的职能认识还是比较藐视的。记得我在县工商局企业股帮助工作期间,负责对全县驻城工商企业进行登记工作,这也是工商部门介入企业的开始。我们工商人员曾去淮安县农业机械厂(全民企业)进行登记工作,接待我们的是操外地口音的一名女副厂长。她开口便问:你们“打指部”怎么也问起我们国家企业的事啦?类似这种情况,所到城内企业无一例外。记得有一次全局机关大行动,分成两个组,一个组由我担任组长,分别检查全城各企业悬挂经营许可证情况,在检查到河西石油公司待业青年门市亮证情况时,对方竟回答:“我们是国营企业,要你那《营业执照》干嘛,不挂执照,看你们能怎么样。”当时按有关规定,给予其5000元罚款处罚。后来随着国家陆续颁布实施的《企业登记工作条例》、《商标法》、《广告法》、《合同法》等法规,对企业的管理才逐渐走上正规。

八十年代初,泰州成立了我省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那时我和企业股一名同事、钦工工商所长去泰州参观学习,回来后,在钦工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乡级“个体劳动者协会”。后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淮安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又成立起来了,我还担任协会的副秘书长。1988年,局领导派我负责组织筹建淮安县消费者协会,计量、物价、卫生等许多部门在协会都承担了各自的职责。消协日常工作主要是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记得南马厂乡有一农民反映,他购买的14寸南京产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在收看中突然起火爆炸了。接到投诉后,通对对现场的调查,我与南京熊猫厂取得了联系,厂家第二天就派了3名同志来处理此事,经过协商,厂家赔了一台新电视机,并赔偿了因电视机起火造成的损失费5000元。事后,这位农民还给我们送来一面绣有“维权的卫士”五个大字锦旗。像这样消费者感谢工商人员帮他维权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1994年,淮安市委、市政府成立“淮安市个体私营经济”办公室,因为其工作与工商职能相关,我被从工商局抽出负责全区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工作,为市委、市政府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上出谋划策,负责督促检查全市各乡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情况。协会每个星期出一次《简报》,半年组织一次检查,年终总结评奖。每年我都得到过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在这办公室一干就是六年,直至退休。

屈指算来,我离开工商岗位也有17个年头了,现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可是不同年代的工商生活与工作,至今难以忘怀,我的26年工商情结始终是我不变的记忆。



周士红近照

近年来,关于富二代的话题也是人们议论颇多的热门话题。目前,作家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唐家三少》,反映的便是这一主题——某富豪家的富二代三兄妹面对对财富以及产业的传承所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有了梦,便会不顾一切地朝着梦想的彼岸进发。文学是周士红的梦,也是周士红的追求。无论是何工作岗,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无论苦与乐,他的文学梦一直没有泯灭。尤其是在现今市场经济大潮中,许多人都去追求物质财富,荣华富贵,他仍然独守着那份清苦,追梦不止。

感动人物

间时常为养母翻身、端接大小便,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造成体力严重透支。2009年起,孙晓晴就感到自己身体有些不适,起初她不当回事,也一直没有和家人说过。直到2010年8月份,她突然感到病情加重,后经市一院检查,她患上了左腿萎缩和肾结石等多种疾病,医生多次劝她住院治疗,可她心一直惦记着养母,实在疼得厉害了,她就买些去痛药品止痛,每天一瘸一拐的坚持上班和精心照料瘫痪在床上的养母。

“苦心人,天不负”。在孙晓晴的悉心照料下,她的养母顽强地活了下来。“记得当年医生说母亲能活个一年半载就不错了,如今已经10多年过去了,她仍然活着,连医生都惊叹是个奇迹。”孙晓晴说。



4月19日,市二院的医护专家一行8人到城东乡卫生院开展“送医下基层活动”。刘素林 蒋成权 摄

敬业还须“精业”

你说我说

有一家企业本来了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生产项目,但由于缺乏出类拔萃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产品质量一直提不上来,致使企业难以焕发生机和活力,最终因严重亏损而停产。可另有一家企业上了同样的生产项目,则因技术力量雄厚,职工队伍整体素质看好,结果,生产很快形成规模,短短几年经济效益就成倍增长,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一位企业家说:“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企业职工仅有爱岗敬业精神已经不够了,还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具备精业本领,才能适应科技进步和事业发展的要求。”这话是很有见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和完善,敬业精神和精

业本领,是当今企业职工必须同时具备的双重素质,二者缺一不可。因为企业职工只有既爱岗敬业,又精通专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造出一流业绩。

敬业是干好工作的前提,但仅有敬业精神而无“精业”的本领,也只能是累而无功。试想,如果搞安全生产的不掌握安全生产规律,怎样去保安全;搞教育工作的不会规章不懂业务,怎么去给职工上课;搞财务的不懂记账、不会核算,怎样才能测算出职工的收入情况;搞政治的自身素质不高,满口脏话怪话怎样才能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搞技术的不懂技规,怎样才能保证施工安全……即使整天忙忙碌碌地投入工作,恐怕也没有多大起色。如果只强调敬业而不注重精通业务,实现安全生产的目的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古人云: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要精通业务,首先需要消除认识的误区,要摒弃

干工作“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的错误思想,牢固树立“平庸就是错,无功就是过”的理念,把衡量工作能力强弱、工作好坏的标准定在是否精通本职业务、出了多少成绩上。其次,要勤学善学,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如果说勤学是通向“精业”的必由之路,那么善学就是通向“精业”的最佳捷径。只有带着问题、带着疑团去学习,才能学进去,学有所得。再次,要充分发挥典型的导向作用,要用典型的激励作用,带动职工钻研业务、精通本职,促进那些工作效率低的职工认识到差距,提高自身素质,迎头赶上,做到即敬业,又“精业”。只有确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唯有学习、学习再学习,精业、精业再精业,把敬业精神与精业本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不断加剧的竞争中取胜。

心中有梦

——小记淮安作家周士红和他的作品

本报记者 杨文龙

“心中有梦脚下有路,背着行囊一直向前进发;笑迎风雨走遍天下……”一曲《心中有梦》唱出了淮安作家周士红的心声。

周士红,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做过中学教师、乡政府文书、乡镇企业厂长;从事过国企、民企管理工作,现供职于江苏淮安建设集团。自小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他,走上社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始终驾着梦想之舟,在文学海洋里迎风破浪,坚持不懈向梦想的彼岸进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共发表出版作品二百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人约天涯》《新生行业》《飘在都市》,中篇小说《孽海情缘》《燕子归来》等。

周士红的作品大都以文字雅致、逻辑严密、脉络清晰、语言丰富见长。作品多次获得不同奖项,其中,小说《魔鬼诱惑》获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奖;散文《最爱书田无穷趣》获“蔡丽双杯”图书缘全国散文大赛奖;散文《月夜静悄悄》获上海市第六届职工艺术节散文大赛奖。长篇小说《新生行业》获淮安市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奖。中篇小说《燕子归来》获江苏省企业家协会《共创》2014年度“安邦杯”小说大赛奖。

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约天涯》是其在上海打工期间创作完成的一部现代题材的作品,先在“红袖添香”文学网站上连载。小说立意新颖、构思奇巧、情节起伏,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读性强。读后令人回味,给人以启迪。显示出作家独到的社会视角以及不俗的写作功底和创作潜能。

他的长篇纪实小说《新生行业》于2012年8月出版上市,是一部首次全面深度揭示国内传销内幕的长篇纪实小说。《新生行业》采用的行业资料是真实的。作者深入采访过多位曾深陷传销行业的各阶层人物,书中描写传销洗脑的原始资料都是这些朋友悄悄提供的,因而十分详尽真实。作家用小说的手法把这些真实的材料串起来,力图塑造传销行业里的各种人物形象,反映他们的真实心理,更能进一步发挥警示作用,让更多人认清传销的真实面目,不上当受骗。《新生行业》也为人们研究“传销黑幕”留下一份宝贵的资料。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说法是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温家宝总理曾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

活。这引起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更大关注。

周士红2013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漂在都市》表现的便是这一主题——

上湾村几个“80后”“90后”新一代农民工怀着对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憧憬,分别来到他们向往的城市,从事不同的职业。但城市并没有欢迎和接纳他们。他们怀揣鲜活理想却毁于残酷现实,始终是城市的底层人物,在“三低”、“三多”环境中顽强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

小说揭示主人公不同的生活遭际。在城市谋生过程中,他们曾流失过乡村人特有的淳朴、勤劳的美德,而被另一种激情和投机的品性所替代。他们躁动、焦虑,不肯安于现状,却热爱生活、珍惜爱情、渴望理解、向往成功;他们经历苦乐、遭遇贵贱。他们的希冀、理想、爱情、婚姻与现实反差很大。最终他们既无法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乡村,始终在现代化生活的边缘飘来荡去……

大伯的故事

骆千民

给养母喂饭、擦洗身体、按摩身子……孙晓晴每天重复着这些看似简单的琐事,从未间断,至今已有16个年头。

孙晓晴是南闸镇新河头居委会人,现任镇敬老院副院长。16年来,她用自已的行动改变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

“在我小的时候,养父养母把我领回家是这样照顾我的,他们供我吃穿、上学,帮我成家、立业。现在养父不在了,养母年老生病,我要照顾好她到最后。”孙晓晴感激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并以实际行动予以回报。

孙晓晴养父孙兆虎34年前病故,她的丈夫赵长军在上海船队上班,儿子儿媳都在昆山打工,每年很少回家,她要照顾好76岁的瘫痪养母,可谓是沉重的负担。面对这一现实,孙晓晴没有退缩,毅然挑起了家庭全部重担。她从养母2000年患病那年起,就吃辛受苦,一边认真在敬老院上班,一边精心照料养母。

大伯出生在书香门第(我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教私塾的),他本可以优于同龄人享受教育的,可他没进过一天学堂。大伯小时候得过“天花”(俗称水痘)险些送了命,病愈后脸上落下了坑坑凹凹的麻子,左眼几近失明。祖父是个极其封建、迂腐的人,他从相貌断定大伯以后不会发达,因此放弃了在其身上的教育投资。大伯是八兄妹中的兄长。祖父为了家庭的生计,常年奔波在外教书。大伯到了七八岁时已力所能及帮我祖母分担起了地里的农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伯逐渐成了家里的中主力,繁重的体力活曾几次让他累倒在田里,还不止一次的吐过血。只有在农忙或过节的时候,祖父才能回家在闲暇之余教他认一些字以及查字典的基本方法。也许是本该上学的人失去了机会,才更懂得珍惜读书。白天大伯总是在田间地里劳作,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他那珍爱的书。他靠仅有的那么一点儿文化功底,像桑蚕食叶一样啃下了蒙文“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小说“四大名著”,《封神演义》《桃花扇》《隋唐英雄传》《薛仁贵传》《岳飞传》等家中存有的古书。可惜!在建国初期“破四旧”(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中,家中大量的古书被抄后堆放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付之一炬化为灰烬。大伯在读书方面是有天赋的,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通常一般人只是在书本上、影视作品里见过过目不忘的人,并未真正目睹,而大伯的确能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夏酷暑的农村不通电。白天炎热难耐时,大人小孩都往河里跳靠游泳洗凉水澡来消暑降温。到了夜晚是漆黑一片,只有蛙鸣虫叫和蝉的鸣叫,噪杂常常使人难以入睡。当时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匮乏,一年也难得上三五场电影,有时为了一场电影竟然要跑二三十里路,纳凉聚会就成了农村人唯一的休闲娱乐活动。通常同村人各自带着自家的小凳,手摇蒲扇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如果能听到有人说上一段书,讲一些趣闻逸事,那就是当时农村人最好的精神享受。大伯的家自然是村里人经常光顾聚会的地方。

大伯不仅记忆力好,而且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他口齿很清楚,叙述故事完整连贯情节生动,村里的人都特别地爱听。当时,我和村里的小伙伴是他最忠实的听众,因为大人们常常有事会落场子。每天吃过晚饭,只要是大伯有空,我们总是早早地来到他家候着。往往是一段故事讲完,我们还不罢休,非得缠着他再讲一段。当年我们年幼无知,一点也不懂得体谅人。大伯的家境不好,伯母过早世,家庭担子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那时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家庭唯一收入来源就是在生产队里做活计苦工分,按工分拿钱。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们缠着大伯多讲了一段故事,结果耽误了那天夜里的翻场(用二齿的草杈将打谷场上摊晒翻玉过的秸秆翻身再碾压)。当时大伯很生气,发誓今后不再讲了。可是第二天我们来了,他照样讲。

我和村里的同龄人是大伯的故事伴着长大的。从大伯的故事中我们知道了许多历史典故和歇后语。这些故事大多数是在课堂上所听不到的,特别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许多古书是被列为“禁书”的,不要说听,在市面上连见都见不到。所幸的是我有一位酷爱读书,记忆力超强的大伯,他弥补了我“那个年代”同龄人本该有的缺憾。

后来,我走上社会参加了工作,听大伯讲故事机会就非常少了。只要我休假探亲,都会回老家拜见大伯。他还是先前的老样子,一有空就手不释卷静心阅读。不过我来见他,他会破例放下手里的书,很乐意的听我讲些外面的时事。待我讲完,他说“这次你想听我讲什么?”我说回来时间短,就算你有时间讲,我也没时间听了。“这不要紧,时间短‘大部头’讲不了,讲讲‘小书头’(短小精悍的微型故事)还是可以的。”因此我每次与大伯相见都能有所收益。1996年秋大伯因病去世,我深为悲痛和惋惜。逝者已矣,但大伯过去讲过的许多故事已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让我受益匪浅。在工作生活中,我常常能从大伯的故事中汲取营养得到启迪。

